

B258/2

9

南海康先生口说

吴熙钊

邓中好校点



中山大学出版社

南海康先生口说

吴熙钊 邓中好 校点

中山大学出版社

南海康先生口说

吴熙钊 邓中好 校点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88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书号：2339·5 定价：1.00元

前 言

《南海康先生口说》(以下简称《口说》),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由他的学生“笔记”的讲课内容的抄本。《口说》现由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珍藏。

“文化大革命”前,杨荣国教授曾指出《口说》对研究康有为早期的学术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由于那时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维新运动及其领导者康有为的评价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未能引起对《口说》的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在探讨康有为思想过程中^①,认真地研读了《口说》及有关资料,对这一抄本的重要性才有了新的认识。

一八九五年,康有为赴京会试,适逢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清政府派李鸿章到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民族危机刺激下,朝野哗然。康有为毅然联合全国会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署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提出“迁都、拒和、变法”和“严正议臣之罪”的要求。“公车上书”震惊了朝野,康有为由此成为当时维新运动之领袖。康有为虽被录取为进士,授工部主事,然而上书却失败了。为了继续进行变法,他认识到必须培育新人,于是康有为决心“还粤讲学”^②。《口说》就是这次讲学时“笔记”抄本。

①参见拙作:(1)《康有为与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载《广州研究》1983年创刊号。(2)《维新时期康有为进化论评议》,载《学术研究》1984年第4期。(3)《康有为评传》,见《岭南思想家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初版。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

伴随着十九世纪末叶西学东渐，康氏以所能了解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进化论思想，对我国古代文化学术作了新的评论。《口说》内容十分广泛，甚至可谓芜杂，但通过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学、今文经学、宋明理学和佛学、清代考据学以至诗、文、词、赋的评述，其中确有诸多发前人之未发的见解。

首先，康氏接受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实测”方法，改变了脱离实际的单纯注经传统方法。

据他的学生张篁溪回忆：“先生之讲学也，亦以穷理创义为要旨，广罗英才而教育之；求广大之思想，脱前人之窠臼，辟独得之新理，寻一贯之真谛。各省学子，千里负笈，闻风相从，前后达三千人。”^①可见，《口说》正是康氏为了在学术思想上，追求超越前人而采纳了西方的新理和新法。正如《口说》指出：“中国人向来穷理俱虚测，今西人实测”^②。康氏以“实测”代替“穷理”，实则以至证科学的思想方法批判“清淡在程朱”的穷理思想方法^③。康氏指出，“康熙间，奈端（牛顿）创重学，法天文学家拉图拉矢（拉普拉斯）以重学考出天皇、海王（按：指天王、海王星）”^④。康氏借力学关于“吸拒力”作用，阐述宇宙起源，是当时关于天体运动的一种科学理论。这一点，从康氏当时尚未公诸于世的另一部著作——《康子内外篇》得到佐证。他说：“积气而成为天，摩励之久，热重之力生矣，光电生矣，原质变化而成为焉。”^⑤又从他在《自编年谱》论及事物内部包含着对立统一结构的理论获得比较广泛的发挥。他说：“气之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理焉。”^⑥在“气、力、质、形、

①《万木草堂始末记》，未刊稿本，现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②④《口说·学术源流》。

③《口说·骈文》。

⑤《康子内外篇·理气篇》，见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

⑥《康南海自编年谱》。

光、声、体、神”八统中，无不包含两个方面的对立，而“拒”、“吸”两力，是宇宙进化的动力。康氏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实证科学的思想方法，突破了笺注经书的思维方法的桎梏，标志着方法的变革。

康氏还吸取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通过生物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来阐明了人类起源的唯物论无神论思想。他指出：“生物始于苔，动物始于介类”，“人类之生，不能过五千年”^①。他强调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②。他把进化的观念同传统“变易”思想结合，以此论证社会同样是进化的。他说：“孔子制作，专重变易，故特立三统，能知此而后可读孔书。”^③康氏借助孔子“三世”改制之形式、宣传“三世”演进的新内容。正如他后来在解释什么是“三世”进化时说：“三世之义，有据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④所谓其道各不同，是指历史每一进化阶段都体现为不同之政治制度：乱世之道是表现为封建专制；升平之道是表现为君主立宪制；太平之道是指人类大同社会。这里，尽管康氏从形式上标榜着公羊学的“三世”说，但实质上是结合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模式，改造公羊学完全没有质变的历史循环论，从而表明康氏当时要求变革的政治态度。他虽然没有提出革命暴力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但既承认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代替封建专制制度是“道变”之必然，其中就包含着肯定采取非爆发式飞跃以促进事物变化的意义。由此可见，康氏持着上升发展的观点，把进化与“变易”思想结合，开创了近代“合中外古今”熔铸新思想的尝试^⑤，这种新的思想方法有助于哲学和社会的变

①②《口说·学术源流》。

③《口说·学术源流》。

④《日本书目志序》。

⑤《口说·学术源流》。

革。

其次,《口说》还以近代自然科学为武器,对宋儒的唯心论作了有力的批判。康氏指出,“朱子以理在气之先,其说非”^①。而张载的“太虚不能无气、此语精绝”。为什么说朱熹“理在气先”的说法是谬误的呢?康氏认为,它违反了“凡物皆始于气,既有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的理论^②。康氏批判朱熹的唯心论,显然与康德的宇宙起源的论点有内在的联系。他说:“德之韩图(即康德),法之立拉士(即拉普拉斯)发星云之说,谓各天体创成以前,是朦胧之瓦斯体,浮游于宇宙之间,其分子互相集,是谓星云。”^③康德的《宇宙发展概论》,阐述了排斥和吸引两种力互相作用,是天体形成的基本原因,也是“自然界永恒的生命”。这种理论打破了十八世纪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一个缺口。康氏以“星云”说作为哲学的结构,提出“以太——星云——不忍之仁心”的结构体系,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把自然科学“仁化”。但是,康氏试图以“星云——以太”来丰富传统的元气说,自身则包含着进步哲学的起点,如果康氏能沿着这一哲学结构加以发展,其创造性成果可能更大。可是,康氏却以自然界说明社会界,把社会的道德品格归之于自然所赋予。这就走向以“亲亲、仁民、爱物”为动力的唯心主义轨道^④。然而,唯物主义虽然在康氏《口说》中不占优势;但,作为一种近代新哲学的萌芽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再次,康氏通过《口说》对我国古代人性论作了评议,阐发了近代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平等独立”的人道主义思想。

处于宋儒以“义理之性”的先验人性论的思想影响下,人的地位和价值,受到了严重的歪曲。朱熹提出“明天理,灭人欲”,严

①②④《口说·学术源流》。在《万木草堂口说》则作“理在气前”。

③《诸天讲》。

重地抑制人们追求合理的物质要求，禁锢了人的思想解放，这种把人的存在说成是以“三纲”之理念存在而存在的理论，完全无视人在社会中应有的人格尊严和作用，是一种封建的蒙昧主义思想。《口说》集中对朱熹所谓“言性即理”的理论命题作了批判。康氏指出，如果把“义理之性”作为人性之本，实则是违反了人性犹如“确诂”的自然属性^①。因为，人性是自然赋予人类蓬勃之生机之一种本能，自是无所谓先天的善和恶。人性既然是“生之质未有善恶”，就有其可塑性。康氏以“伪”作为人性的概括。“伪”即有为的意思。由此，他揭露宋儒所谓“义理之性”，实则是违背“人生有欲，天之性也”^②，是“以佛释儒”^③，即以佛教“清净法身”之无欲观点强加于儒学，变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教条。正因为康氏强调人的爱恶感情不是先天存在的，所以他对先秦诸子的人性论同样作出新的评论。他赞同告子的性无善恶说。他说：“凡言性、皆告子是而孟子非、……性善恶、善恶皆圣人所主也。”^④他以逻辑推理说明，如果从孟子的性善说，那么，天下将“无恶人”^⑤；反之，如果从荀子的性恶说，那么，天下将“无善人”^⑥。因此，“两说皆非”。

康氏的人性可塑理论，实则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平等”、“民权”的追求，起了激励其门人弟子摆脱封建思想的禁锢而导致思想解放的作用，他的门人弟子正是接受了他的思想教育而走向社会改革的维新道路。

康氏的人性可塑理论也遭到封建卫道士们的猛烈抨击。从朱一新、张之洞等顽固派和洋务派对康氏的思想围剿，也可看出康氏

①《口说·中庸》。

②《口说·荀子》。

③《口说·中庸》。

④⑤⑥《口说·荀子》。

在当时思想启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第四、康氏的《口说》，开创了学术联系实际的新文风。

《口说》虽以学术讲演形式进行教学，但决非陈腐的注经、解经，而是把学术与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康氏向学生讲述什么是“孔子之道”时指出，“道”是“路”^①，即治学的根本方向。与此同时，康氏指出，为学之道除了重行之外，还必须注重“讲求”学问的“思辨”方法^②。所谓思辨方法，是指要坚持独立思考，打破八股教条的思想桎梏。他说：“近人之守八股无多怪，如汉人守六经耳，盖利禄之路所然也。”^③康氏卓越地看到，死守八股经义，不仅使思想僵化，更严重的是造成一批追逐利禄之奴隶。故他阐述人应有耻。他说：“孔言：‘行已有耻’，孟言：‘人不可无耻’。耻字甚要紧。”^④康氏还提出写文章的思想和方法，必须扫除当时颇为流行的“三毒”：“窃、贩、庸”，必须做到行文“警、醒、紧”三者。^⑤即教育学生，作文切忌剽窃、贩卖陈货和平庸，要有创造性的见解。康氏之所以极力抨击八股学风，其目的是要求学生发扬学用一致的思想作风。

康氏认为，要做到上述学风、文风的转变，首先必须“激励气节，发扬精神”^⑥，而要发扬气节，立足点就应落在“治学莫大于救国”^⑦。这是康氏把明清以来“经世致国”之优良传统，同近代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颇有成效的教育原则，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①《口说·中庸》。

②《口说·中庸》。

③《口说·八股源流》。

④《口说·励节》。

⑤《口说·文学并讲八股源流》

⑥张篪溪：《万木草堂始末记》。

⑦张伯桢：《南海康先生学案》，载《正风》第一卷，第三期。

康氏不仅教育学生要把爱国主义作为学习的目的，把树立新风作为人生之准则，而且十分重视身教言教。在维新期间，康氏为了拯救民族危机，以爱国救亡为己任。他一再抒发，“从知天下为公产，应合民权救我疆。”^①同时畅谈“民功”，期望达到“人类之美，人类之乐”^②。他写了不少文章，笔调通俗，联系现实性强，在当时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实践证明，康氏在“万木草堂”，培育了一代从事社会改革的栋梁之才，除陈千秋早逝外，梁启超、曾泰、韩文举、徐勤、麦孟华、梁朝杰、梁朝闻、王觉任、陈相泽等康门十大弟子，都在当时社会改革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康氏在我国文明大道上所作出的贡献，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口说》自身也包含着时代和阶级所造成的缺点。首先表现在体系的不严密，甚至矛盾。其次，中外、古今文化的结合，并不全合乎科学，暴露某些主观比附的错误，如把孟子“与民同之”，比附为“全与西人议院民主之制同”^③。但从整体来说，《口说》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叶，先进的中国人急切地向西方寻找真理，重新评价我国文化传统的积极态度。《口说》既敢于触犯封建主义的旧学，也善于发掘传统文化中真、善、美的东西，特别是开创了中西文化汇合的新内容和形式，标志着近代文化变革的新起点，为我们研究近代文化思想演变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关于校点《口说》的几点说明：

第一、原稿属《口说》类，诚为张伯桢所说，“先师口讲，为门弟子所笔记。”^④因此，各句之间独立性较大，往往是一句就是一段，而句子与句子之间连贯性、逻辑性较差，体系不严谨。

①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第242页。

② 《民功篇》，见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

③ 《口说·孟荀》。

④ 《南海康先生学案》（三续）。

因此，在校点过程中，仍保持原稿本来面貌。在排印时，只在句与句、段与段之间加“○”符号，以示原抄本句、段之间的独立性。

第二、我们在校点时，加了现代标点符号，一切尊重原著。由于原稿系手抄本，草体字，其中错、漏字乃至读不顺之句颇多，我们除参照《万木草堂口说》（北京大学所藏的复制本和复旦大学的复制本）和其他零散资料互订外，并依据我们所能掌握的古文献资料略为改正。凡文中带〔 〕符号的，是改过来的字或添加的字、句；而（ ）符号的，则是原抄本中的明显错字、漏字或重复文字。

第三、原稿涉及书名、篇名达数百种之多，无法一一考证，只能依据我们的水平对其中确有其书、其篇者标以书名《 》符号，有些一时无法确证的，则保留原手抄本面貌。人名、地名，一律不标出。

由于我们学识有限，校点过程中错误难免，敬祈专家、读者指正。

吴熙钊

一九八五年六月于中山大学

目 录

上 册

一、学术源流一	1
二、学术源流二	3
三、学术源流三	5
四、学术源流四	7
五、学术源流五	9
六、学术源流六	11
七、学术源流七	12
八、孔子改制一	15
九、孔子改制二	18
十、《洪范》	21
十一、《易》	23
十二、礼制	24
十三、礼	25
十四、乐学	27
十五、褫衿	29
十六、褫裳	29
十七、礼运	30
十八、王制一	31
十九、王制二	32
二十、《中庸》一	36
二一、《中庸》二	39

二二、《中庸》三	42
二三、诸子一	45
二四、诸子二	46
二五、诸子三	48
二六、《列子》	50
二七、孟荀	51
二八、荀子(兼言孟子)	52

下 册

二九、《春秋繁露》	57
三十、汉晋六朝唐宋学派	62
三一、宋元学派	63
三二、明国朝学派	66
三三、《正蒙》	72
三四、《通书》	73
三五、格物	73
三六、励节	74
三七、辨惑 据德	75
三八、主静出倪 养心不动	76
三九、变化气节 检摄威仪	77
四十、孝弟 任恤 宣教 同体饥溺	79
四一、《汉书·百官公卿表》	81
四二、《史记·儒林传》	83
四三、《史记》两汉《儒林传》	84
四四、《汉书·艺文志》	85
四五、律历	86
四六、经策	87

四七、文章源流·····	88
四八、文学 并讲八股源流·····	89
四九、论文·····	92
五十、骈文·····	92
五一、赋学·····	93
五二、讲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 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94
五三、八股源流·····	95
五四、袁稿·····	96

上 册

学术源流 一

凡物皆始于气，有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所以能生人生物者，理也。人曰在气中而不知，犹鱼之曰在水中而不知也。○朱子谓理在气之先（一作前），其说非。○有气即有阴阳。其热者为阳，冷者为阴。○现考地球所生，从日出，〔而〕月〔又〕从地出。○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一条额尔齐斯河，流入俄国；一条阿母新头河，流入波斯；一条印度河，流入印度；一条黄河，流入中国。（见佛书《玉合经》）○昆仑者，地顶也。知地顶之说，而后可以知人类之始生。○现考人类之生，未过五千年。总之，去洪水不远。或者洪水以前之人，皆为洪水所灭。以历国史记考之，人皆生于洪水之后，计自洪水至孔子二千年，孔子至光绪丙申二千四百四十七年。印度开国最古，波斯开国亦早，盖近昆仑也。○凡有数千里平原必能创造政教文字，故地球内四大域皆然。今日本全是依人之政教文字者，盖国小不〔然〕〔能〕自创造也。○中国、印度、波斯、小亚细亚，共为四大域，是开辟之始。○光绪己卯，测出地球之外，另有八十二个小〔行〕〔恒〕星。壬辰，又测出五十二个。○近来所开煤矿，至五十里尚有煤，二里则无人骨。○外国之教，以婆罗门为最古。马哈麦、佛氏耶氏，皆从它一转手。马哈麦弟子名某亚已老。教分两门：一言丹鼎，葛稚川是也；一言符录，张天师道陵是也。○自古至今，以地而论，则中国与印度。以人而论，则儒与佛。儒者，孔子之国号也。孔子未改制以前，皆淫佚无度，而孔子以布衣整顿之。故孟子称周公则只曰兼夷狄，驱猛兽。至称孔子作《春秋》，则曰天子之事也。○太古时亦崇尚鬼神，自孔子始定祭

祀之礼，故后世淫祀颇少。○凡《公羊》所讯〔者〕，皆旧俗也。○与匈奴通，自汉始。故满人呼中国〔以〕〔曰〕汉人。今英人呼中国人曰唐人。○言昆仑之说者，莫精于佛书，以印度近昆仑也。《海国图志·昆仑考》甚谬。○罗马之政教，出于波斯。波斯出自印度。印度语言文字皆本天竺者，音用支、歌、麻韵。○古时都珠，即今之阿泽槃木者，经洪水后，在最下最肥之地。自兴安岭〔以〕外，六千〔余〕里皆槃木。○禹时有万国，其说确是，即土司也。汤时有三千国，武王时有八百国，春秋时有二百国，今地球〔仅〕〔有〕六十余国。《王制》言一千八百国，其说恐非。○孔子言禹、汤、文、武，欲后王知所遵守也。言灾异，欲后王知所警惧也。○《春秋》虽言天道，实言人事。《仪礼》特立三纲之义，而诸经因发明之。○《易》，言其生也，生故有偶。《春秋》，言其治也，治必一统。○《春秋》治国，《孝经》治家。汉入尊《孝经》过于《论语》。○《孟子》一书，言义理自仁始，言人伦自父子始，言制度自井田始。○孔门曾、夏皆传〔粗〕〔祖〕学，子思能传心学。○《大戴礼》、《曾子》十篇专言孝，是曾子之学。○孟子最能发挥父子之道。其言尧舜之道，亦只孝弟而已矣。○九族万民者，父子之余也。礼乐者，井田之余也。○孔子精神全注在行助法，不得助则行贡。○《春秋》尚嫡，不甚重妾，〔妾〕以子贵。○庄子言《春秋》以定名分，其说最的。○《中庸》三达德，治内者也。五达道，治外者也。○曾子居武城时，九十余岁，子夏居西河时，百余岁，皆〔为〕孔门〔最〕高寿弟子。○一部《仪礼》，多发明“报”字。○孔子以下至本朝，宫室之制，皆本孔子。衣服之制，行至明朝。○五船山〔已〕发明旧制俗之大义。○独名之曰：“乱臣贼子者，孔子之正三纲也”。○孔子制作，专尚变易，故特立三统。○知此而后可以读孔书。○《仪礼》无高祖之服。○欧洲皆是期服。正五九不用事者，佛法也。○拜神用香，佛法也。丧事用七，亦佛法也。○万物之生，皆由于地动。地动者，轮回也。○血脉之

轮回，我气人，人亦气我，气质之轮回也。○地面之水为日力所吸，上而成雨，雨变为水，亦即轮回之义。○三统、文质、昭穆、五行、五声、六律、十二管、五色、六章、十二条，王、帝、皇、民，亲庙迭毁。○孔子最重报施，礼无不答。（记）〔故〕言：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答拜者，此平等之义也。○地震必于赤道之间者，其处有隙，火气所凝。

学术源流 二

中国在昆仑之南。○《世本》伪书。夏、汉、唐为古今三大国。○《尚书》言蛮夷猾夏，是后人传说。○以德报怨，及棘子成言质，亦改制也。战国诸子皆改制。○《韩非子·显学篇》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又言儒、墨皆托古，甚可苑。○魏文侯推行孔子之学，李克推行井田之学。○《诗》、《书》、《易》、《春秋》，皆古名也。○宋钘与墨子相近。○太学始于汉武，文、景时无之。○孔子之学，推行者，七十子始，（尊之者）〔行始于〕魏文侯。立博士者，秦始皇。大一统者，汉武帝也。○两汉所立博士，皆今学。○孟子传公羊之学，荀子传谷梁之学。孟子高明，直指本心，是尊德性，陆、王近之。荀子沈潜，是道问学，朱子近之。○学术之争，争于道外者有各（一作异）教；争于道中者有汉、宋。（《史记》除窜乱外，皆孔子今学）。○《前汉〔书〕》杂乱无章，《后汉〔书〕》为伪学，刘歆作。读《史记》，班氏仍之，所异者二（一作三）万余字（见《西京杂记》）。○《史记·五帝三王本纪》谓三代皆各数百年。《韩非子》则谓各千余年。《汉书·吾邱寿王传》则谓唐虞三代六千余年，然则三代上果不可考矣。○亘古开国，莫大于波斯。○五代孟昶广正二年，始刻书。○逻罗十年一贡，缅甸亦然。安南三年，高丽每年皆入贡。○古今立学有三：西汉十四博士，用孔学；晋太康九年，立博士，用刘歆